

•探索与争鸣•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回顾与展望

编者按：借由组织编写《中国体育学年鉴 2024》的机会，邀约中青年体育学者在各自深耕的研究领域撰写回顾与展望，其内容可谓自由争鸣，多元探索，有的通过宏观叙事梳理整体研究方向的脉络，呈现出宏大叙事的文风；有的以研究方向具体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内容鞭挞入理反映体育学争议话题，望笔谈能为体育学发展带来一些反思。当然，笔谈所呈现的研究领域仍不够全面，也请学界同仁从不同分支阐发更多观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体育学一级学科之下划分为 4 个二级学科，可谓文理融通，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25 年以前一直用体育学来指代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因而笔谈有时亦沿用“体育学”这一统一称谓的习惯表述。除唐炎与邵峰教授文章外，余下观点大多来自于《中国体育学年鉴 2024》编写过程。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5)05-0001-15

体育学的探索历程与精进理路

易剑东

(温州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1 对体育学发展问题关注的由来

在体育学术界，我的研究领域跨度不小：从体育史转入体育经济史，再进入体育新闻传播学，跨入体育社会学，踏入体育经济管理学，现在做奥林匹克和体育治理研究。这些兜兜转转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但我自己深知，这些看似意外的转向是我浓烈体育学术情结的自然延续。

体育学界在 2011 年前后遭遇了一次大冲击，教育部在这一年调整学科设置。艺术学成为新增的学科门类，而一直希望进入学科门类的体育学还留在教育学门类之内，和教育学、心理学一起并列作为一级学科。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体育学还停留在一级学科的状况，对体育学界来说是很尴尬的。但是我个人以为，迄今为止，体育学界对这个巨大反差的反思是不够全面和充分的。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

第一点是我跳出体育界自身局限而放眼整个教育体系看问题才领悟到的。

承担着体育学科发展主要职能的体育院校乃至师范大学体育院系长期以来是笼统、含混的粗放式发展的，不像艺术院校分门别类地在子学科领域分别精进发展，比如艺术界有综合性的艺术院校和传媒院校，也有大量的舞蹈学院、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而体育把所有的门类都放在大的体育范畴里发展，精细发展的程度跟艺术相

比显示出巨大的差距。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很多体育院校搞单项运动学院也很难快速取得成效的历史原因。当然，20世纪 50 年代的中央体育学院曾经有水冰系、武体系这样的设置，80 年代上海体育学院也短暂有类似田径系的设置。但毋庸讳言，体育院校整体上并没有在学科分野思维指导下发掘运动专项的发展观念和制度设计。具体而言，其他学科与艺术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融合是长期持续并且形成稳定结构，如陶瓷史、戏剧社会学、戏曲美学、影视经济学等是六七十年来没有间断发展的。而反观体育学科，除去 20 世纪 80 年代启动的单项运动史丛书，多数学科与体育的结合是总体性而非具体性、整体性而非个体性。例如，体育学术界有体育美学、体育哲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学等学科，却鲜有足球生物力学、篮球心理学、排球社会学之类的学科。发展到当前，甚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盛极一时的体育新学科中的不少学科都断档了，如体育美学几乎没有引领性学者。

第二点是我到江西财经大学工作以后经过比较才发现的。

我曾经分管过学校的招生就业工作。记得有一年学校的艺术学院招 300 多学生，院长告诉我说有 1 万多人报考，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那时候我了解到，全国最好的体育院校——北京体育大学的单招考试，考录比只有 5 : 1 左右。而一个在艺术领域显然不居前列的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其考录比超过 30 : 1。我一下子看到了艺术学和体育学的巨大差距，这个差距的原因很简单，太多的人拥抱艺术，而选择体育的人非常有限。

为什么艺术和体育的报考量差距如此之大？也就是说青少年投入其中的人数差距如此巨大呢？目前全

国在校学习的艺术生的数量应该也是体育生的 5 倍以上，每年高考录取的艺术生人数也应该在体育生的 5 倍以上(也许这才是导致外语分数线艺术考生低于体育考生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是艺术学的门槛比较低，特别是有逐级递进的设置。其涵盖从初学到逐步升级进阶过程的几乎所有人群，比如钢琴 1~10 级，还有不同序列，给了很多青少年踏入门槛和逐步提升能力很好的辅助体系和晋升渠道，这是体育很难媲美的。

体育界长期以来按照专业三级、二级、一级以及国家健将、国际健将构建自己的升级体系，往往让人望而生畏。比如在我读书的年代，男子 1 500 米跑 4 分 40 秒才能达到三级，4 分 15 秒才能达到二级。这种设置把很多孩子及其家长早早地挡在门外，大家一看运动技术等级的通级苛刻且艰难，很多人对体育行当望而生畏。这也导致体育在吸引青少年方面跟艺术相比出现巨大差距，导致报考体育的大学、院校、专业的学生显著少于艺术学。所以体育学没能够像艺术学一样升级为门类，这可能是最基本的原因。

必须提及，大约 2015—2018 年间，国家体育总局及部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协会曾经动手研制运动项目的业余等级标准或青少年业余等级标准，甚至有乒乓球、游泳等项目出台了标准。但遗憾的是，这些标准并没有得到很好推行和较大范围的推广。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只有马拉松这个热点项目，目前有专门的大众选手等级标准，包括精英、一级、二级、三级。可以说，体育学科发展要想形成巨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在进行业余水平分级和吸引青少年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三点是我在美国访学时了解其体育学科状况以后参悟出来的。

2012 年 9 月—2013 年 9 月，我有幸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比较系统观察和了解了欧美体育院校中体育学科的发展和中国的差异，我发现体育学的发展需要整体的思维架构，而中国在这个思维架构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美国没有独立的体育学作为门类，甚至没有独立的体育学专业。但美国教育部的学科门类表中有 16 个学科门类，其中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 (Parks, Recreation, Leisure, and Fitness Studies) 这个门类，把多数体育学科和专业涵盖在其中，这是一个遵从社会现实和市场状况的分类。换句话说，美国的教育体系内并没有一个边界清晰和定义明确的体育学科或体育专业，始终把体育运动实践与娱乐、休闲、健康、锻炼、身体活动等应时而变地耦合在一起。在社会实践层面，世界上多数国家也不像中国这样，谋求在一个具有统摄性的体育术语和监管制度下的所谓体育学科、体育

学、体育图书等的发展。一个很容易发现的普遍情形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体育事业或产业管理部门，是与教育、青年、艺术、民政、医疗乃至安全、宗教等组合在一个部门的，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没有政府体育部门的，体育运动场地设施的建设与管理，通常在一个名为 parks & recreation 的机构之内。

2 中国体育学科分类的演进

中国的情形是，体育学在多个统摄性机构之下发展，包括国务院学位办下属的体育学科评议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下辖的体育学科评审组，还有国家标准下属的体育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国图书分类法等。应该说上述 4 种学术和学科管理序列中，均存在着不甚严谨的情况，未能遵循“不交叉、无遗漏”的分类原则。比如，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国家标准中，出现具有统摄意义的“体育理论”，与其他列出的学科明显存在交叉，已经蔚为大观的体育社会学却不在其中。

2025 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阶段，出现可喜现象，1997 年进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序列的体育学被置换成了体育学与健康管理。这说明，这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层面的最高机构，赋予体育学术界更加宏大和深远的时代使命。这一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相信会很快显现出来。

我国教育部学科分类目标中的体育学在 1997 年确立下来，分设了 4 个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我以为这个结构并不合理，也不讨巧。顺便说一下，这样的学科分类，不仅无法与世界范围内惯常的体育学术体系进行有机的对接和有效的对话，而且还容易引发一些争议。比如，国内不少院校把运动人体科学这个二级学科翻译成 sport science，这显然不符合英语世界对这个学科的现实理解。

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个含混的涵盖面极宽的学科名称，极易造成错位和误解。文史哲经管法教艺在中国都是学科门类，与其相关的体育研究却被体育学一并归入三级学科层次，附属在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个二级学科之下憋屈地发展，学术管理实践中引发出的矛盾和纠葛无穷无尽。比如一篇体育法学的研究论文，很可能被送到一个完全没有法学基础知识的其他社会科学背景的评委手里评审（都属于同一个体育人文社会学二级学科），结果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还有一个现象极其鲜明：欧美主导的英语世界里，体育学术刊物几乎都是分门别类和精细分工的，如《体育社会学评论》《欧洲体育管理季刊》《世界体育史杂

志》等。与之形成明确反差的是,中国的体育学术刊物绝大多数是以单位为分类标准,笼统涵盖体育学科论文,如《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大学学报》《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浙江体育科学》。从现实的体育学术刊物编辑部人员结构看,多数综合类体育学术刊物的编辑人员配备都无法涵盖差异较大的4个体育学二级学科。

从逻辑上看,民族传统体育学跟体育教育训练学的区分度并不大,非要站在传统文化角度去单列,实际上造成的是尴尬。所以目前我国一些早期获批的体育学博士点单位,很少有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招生,有些被并入体育教育训练学,甚至也有和体育人文社会学一起招生的情况。虽然现在我国还有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但是民族传统体育学这个二级学科经常被迫消失在博士招生目录中的尴尬依然显性地存在着。

从学科分类不遗漏和无交叉的理想原则上看,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体育教育训练学之间的界限并不严谨。中国体育教育界长期存在的术科,显然包含了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而不仅仅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田径游泳等项目。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特性角度让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单列在运动项目学科理论之外,意图彰显其独一无二的民族传统文化属性,想法有一定合理性乃至建设性,但现实困境却无法化解。原因很简单:日本空手道、韩国跆拳道、巴西柔术等别国的体育项目,同样存在着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属性。甚至田径、游泳、足球这些现代体育项目,也不能说没有其发源时就带上的民族传统文化印迹。所以,非要在整个运动项目序列再单列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意欲凸显其特殊地位和作用,其实在学科研究和管理实践中难以达成。恐怕这就是不少传统的体育学博士点单位慢慢淡化甚至取消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招生方向的根由所在。

至于体育教育训练学这个涵盖除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外所有运动项目的二级学科,同样面临着尴尬和纠结。因为目前全球范围内流行的100多个运动大项,各自有着不同的历史、社会、经济等多元样态,也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序列中特性鲜明。虽然这些运动项目有着某些共性和整体性,但其个性和特殊性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难以支撑相关实践的发展。

在中国的体育院校内,长期以来存在术科与学科之间的分野,虽不正式,却一直发挥着对相关人员的区隔作用。比如,教授足球运动技术的就是术科教师,讲授运动生理学的就是学科教师。相互交叉的人员不是没有,但总体上不多。多数教师是学科、术科泾渭分明的。这种情形,与欧美国家体育院系的情形是明

显不一样的。多数欧美国家是按照我们的学科区分教师的,不会按照术科划分教师。换言之,中国有足球和体操教授之类的称谓,而欧美则是运动生理学和体育心理学教授之类的区分。1997年教育部将除了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外的术科统一纳入体育教育训练学以后,称呼篮球教授之类的现象略有减少,但依托所谓学科术科而非以学科统摄的习惯,在我国依然比较强劲。

3 《中国体育学年鉴 2024》的编写特点及后续设想

鉴于我国体育学的长期发展,我特邀十余位中青年学者分不同研究方向撰写《中国体育学年鉴 2024》,因而有了这一组反映体育人文社会学前沿动态的笔谈,“年鉴”有如下特点与后续思考。

坚持前沿性。我尽力要求各位编委注意捕捉最新学术动向,一定要把追踪国内外本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及行业动态作为基本要求,要紧盯最新学术会议、行业报告、重要著作出版和重磅论文发表等。

注重系统性。在完成年鉴的各项内容时,我始终要求编委们完成著作简介、论文荟萃、学人小传等不同内容时构建稳定的书写框架,按照要素齐全完备的要求展开,要保持对各项内容的结构框架基本统一的写法。

强化针对性。在多次年鉴内部的讨论会中,我反复强调,中国体育学年鉴要树立服务学者和学生的鲜明意识,写出来的内容要能够为学者掌握学界动向和了解最新成果的特点服务,要为研究生们写作学位论文找到学科特点和理论框架、成果精华等服务,而不是仅仅完成一篇学科综述。

关注现实性。学科是为现实服务和反映现实问题的。中国体育学年鉴不能成为故纸堆里的文本,而应该直面中国体育鲜活的实践,把理论界对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思考充分揭示出来,使体育实际工作者也可以从年鉴中获得启示和借鉴。

坚守学术性。学术性是中国体育学年鉴区别于中国体育年鉴的最显著特征。我在和编委会成员的交流中,多次提及年鉴必须具有浓烈的学术意味和彰显鲜明的学术情怀,成为学者的朋友和伙伴,成为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帮手和助手。

面向未来,中国体育学年鉴编委会的同仁们希望依托年鉴这一作品,广泛拓展中国体育学术成长和发展的平台,以系列化的努力推进中国体育学的成长和成熟。为此,编委会同仁们将努力做好下列几件事:继续完善学科年鉴,包含增加或调整学科、研究领域,强化编辑小组力量,使年鉴的质量逐步提升。每年组

织一场专题会议。借年鉴发布会之际围绕年度中国体育学的进展分领域召开专题会议，规模150人左右。每年进行一次方法培训。根据年鉴编委的档期在暑假安排不同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博士生培训班，规模50人左右。不定期编撰学人小传。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不定期组织编撰体育学人小传，向青年学人讲授中老年体育学者的人生感悟和治学经验。持续运营一个学术平台。新设或改名建立一个公众号“体育学年鉴”。并依托该平台吸收学术界对中国体育学发展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和看法。评选年度优秀成果并奖励。根据年鉴编撰进度，每年年底评选上一年度的优秀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并筹集专项资金进行奖励，与年鉴发布同步。

《中国体育学年鉴2024》是一部浸润着中国中青年体育学人心血与汗水的新作，是我们奉献给中国体育学术界和广大体育学人的一份微薄礼物。我们希望她能成为中国体育学不断成长和成熟历程的一段见证，更希望她能成为广大体育学人时常翻阅的一部枕边书。

学校体育学知识生产中的问题与思考

唐炎

(上海体育大学，上海 200438)

学科建设本质上是知识生产的活动。知识之于学科犹如人之于社会。社会无人难成，也因人而分高下；学科无知识难立，也因知识而分良莠。正如人的生育与培养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行动一样，知识的生产与纯化是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当我们从学科视域讨论学校体育学的发展时，本质上是对该学科知识生产行动的审视。为了让审视的行动不偏离方向，有必要对“何谓知识”的问题做一些简要的阐述。

所谓知识，按照辞书上的解释，是指“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或者是指“人类对客观事物和人自身研究的成果”。这些解释虽是共识，但提供的信息还不充分。欲对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还需要对这两种解释中的“成果”做进一步明晰。换句话说，要想较为透彻地理解知识，需要回答知识成果是以何种方式(即知识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在日常交流中，不少人会脱口而出，知识成果的呈现形式不就是论文、专著、报告之类的东西嘛！这样的回答，其实是把知识形态本身与其传播载体混淆。论文、专著、报告之类的东西，确实可能内含知识，但它们只是传播知识的载体。在这些载体中，只有那些含义明确的概念、证据确凿的

观点、逻辑自洽的理论才能称之为知识。这句话同时也表明了知识的3种形态——概念、观点和理论。概念反映了我们对事物(现象)本质特征的把握，观点表明了我们对不同事物(现象)之关系形成了恰当的判断，理论帮助我们基于某种判断而采取行动时提供指导。

基于以上理解和认识，以此反观学校体育学的学科建设，很多问题立即就显露出来了。作为中国体育学最早建立的分支学科之一，学校体育学的基本概念有哪些？或者说，作为一个新手要想进入学校体育学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必须要知晓的概念有哪些？事实上，当我写出这个问题时，也有些茫然。我想，大多数人会说，最基本的概念当然是“学校体育”。然而，当我们说出这个答案时，问题接踵而至。因为，只要查阅历次出版的《学校体育学》教材，就会发现很少教材对“学校体育”做出过明确定义。诸如《辞海》一类的辞书虽有解释(非严格的定义)，也是多年未变。众所周知，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而像学校体育这类社会性事物总是顺时而变的，很难出现“今月曾经照古人”的情况。那么，学校体育这个概念的内涵按理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发展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学校体育这个最基本的概念外，其他诸如体育教学、体育课程或者更下位的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方法等概念，也在不同程度有着类似的境遇。

在观点和理论层面，情况似乎比概念的境遇要好一些。在学校体育学领域内，时有新的观点甚至观点的争锋出现，初期如在思想层面的军国民主义与自然主义之思、早期如在目标层面的体质与技能之争，近期如在体育课层面的强度之辨，新进如在教学实施层面的大单元之困。同时，也产生过诸如“真义体育观”

“技术健身论”“成功体育教学模式”“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等一批理论。这些观点和理论，有的已经淹没于历史，有的还尚待实践更进一步的检验。真正具有历史回响、迸发时代强音的观点和理论还不多见。

以上这些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对学校体育的认识成果(知识)在不少方面是落后于学校体育实践的。然而，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放眼整个体育学领域，有关学校体育议题的研究成果(非知识成果)无论是历史的跨度还是数量的规模都具有绝对优势。对此，大家只要通过相关学术平台进行主题词搜索即可得到证明。这也就是说，在学校体育学领域，知识生产的行动既具有持续性也具有规模性，但知识本身却不尽人意。毋庸讳言，这种吊诡产生的原因在于有关学校体育的知识生产出现了问题，甚至在整个体育学领域，这种问题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不复杂, 归纳而言,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这是“全民科研”的必然结果。在整个教育系统, 各学段体育从业人员的职业成长都需要研究成果支撑, 发论文、拿项目几乎成为所有职业成长焦虑的主要来源。然而, 历史的经验表明, 研究是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 而“全民科研”本身就是“反专业”的非理性行为。就如当年的全民炼钢一样, 全民齐上阵, 浪费大量资源, 产生一堆无用的铁疙瘩。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 体育教育的工作确实具有“研究性”, 但工作的“研究性”并不等于专业的“研究工作”。其二, “全民科研”随之带来的是学术资源的紧张、学术环境的污染和学术风气的下滑。其典型症状就是研究工作追求“短平快”, “发表欲”压过了“求知欲”, 本该久久为功的事, 变成了囫囵吞枣的快餐行为。于是, 本该循着真实问题走的研究工作变成了跟着时事“热词”跑的码字行为。其三, 追求短平快的研究工作又造成了高质量学术资源积累的缺失。在学校体育学领域, 产生了大量的调查问卷, 但几乎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数据库; 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验, 但很少有可以重复验证的规范性实验方案。规范可靠的长周期的纵向数据积累, 是发现重大学术问题的重要支撑。没有重大学术问题的发现, 何来重大研究议题的确立, 何来重要研究工作的开展, 又何来重要知识的产出?

学校体育关乎亿万学生的健康成长, 学校体育是国民体育的基础,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学校体育为研究对象的学校体育学, 需要沉下心来扎实开展知识生产的工作。不过, 对于具体从事该领域的研究者来说, 这确实需要勇气和决心。

体育社会学: 如何平衡学术创新、 实践导向与社会责任

熊欢

(上海体育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438)

1 争议的起点: 实践导向与理论缺失的矛盾
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兴起源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迫切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体育体制改革、全民健身政策落地、竞技体育社会化等现实议题, 推动学科以“实用主义”为起点——研究者纷纷投身于“体育体制改革”“大众体育”“体育公共服务”等实证调查与对策研究中。然而, 这种强烈实践导向逐渐

暴露隐忧: 研究沦为“政策注脚”, 多数成果停留于现象描述或对策建议, 缺乏对社会结构的深度透视; 理论空心化导致学科陷入“解释力困境”。争议由此而起: 当学科忙于“解决问题”, 是否忽略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 这种自我追问揭开了更深层学科困局。

2 学科困局: 三重失衡的结构性困境

1)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体育社会学长期面临学术创新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 其根源在于两重结构性缺陷。首先, 对身体维度的研究理论穿透力较弱, 常将身体及其运动行为简化为指标容器(如老龄化议题中仅聚焦运动能力数据, 忽视身体衰老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镜像映射), 这种指标化处理消解了身体作为社会隐喻的批判价值; 其次, 理论移植过程中出现的简化倾向以及对母学科的过度依赖构成双重限制。这种现象表现为机械地将西方理论(如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应用于中国农村体育时, 忽略差序格局特殊性质)进行移植, 同时过分遵循母学科社会学的既定框架, 使研究沦为既有理论模型的体育案例注脚。最终导致学科陷入“验证性循环”: 通过重复检验社会学理论的体育适用性替代原创知识生产, 形成论文增量繁荣而实质解释力贫乏的学术僵局。对运动身体洞察力的缺失是内生动力不足的基础性原因——它使学科失去独特的观察视角; 而双重理论依赖则是直接导致创新乏力机制缺陷, 两者共同构成内生动力不足的逻辑闭环。

2)实践导向的路径依赖。体育社会学在实践导向中逐渐陷入路径依赖的危机, 这种危机首先表现为研究范畴的自我窄化, 当学科过度聚焦于“体育内部事务”时, 其成果往往会被技术性“行业报告”, 割裂了体育现象与社会结构性转型的深层联动。与此同时, 方法论层面暴露出单一化倾向, 以量化问卷为主导的实证主义范式, 导致体育参与中那些流动的体验性维度和复杂的情感性维度被系统性遮蔽, 这种对“人”主体性的忽视, 进一步加剧学科在分析现实问题时的解释力危机。

3)社会责任的普惠性缺失。体育社会学在社会责任层面同样面临着普惠性缺失的困局, 其核心矛盾体现为学科知识再生产与社会价值传递的脱节。一方面, 虽然体育现象本可以成为透视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窗口(如农民工通过篮球运动建构城市归属感的典型案例), 但这类研究往往局限于体育学科内部讨论, 未能有效反哺母学科社会学对人口流动性、空间正义等重大命题的理论深化。另一方面, 当涉及体教融合政策争议或运动员归化现象等社会热点时, 学科的公共表达呈现失语状态: 研究者要么缺乏介入公共讨论的自

觉意识，要么无法将专业话语转化为大众可理解的论述方式，致使体育社会学知识长期困于学术高墙之内，弱化其在社会价值传递过程中的应有贡献。这既暴露出学术共同体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局限，也阻碍了体育社会学作为交叉学科本应具备的社会启蒙功能，弱化知识传播的社会价值。

3 破局路径：三角平衡框架的构建

要打破困局需以“身体在场-本土体系-普惠价值”为目标，重构学科生态。

1)回归身体：激活学术创新的原动力。体育社会学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在于实现深刻的“身体”转向，在运动身体的物质性与社会性互构中开掘新知，并将中医身体哲学、儒家修身观等本土身体观融入研究范式，以此突破西方理论的主导，更能从身体这一体育实践的本体出发，剥离对社会学母学科的过度依赖，开辟具有文化主体性的学术创新路径，最终形成解释中国体育现象的原生理论范式。

2)本土重构：实践导向的范式升级。本土重构的关键在于打破体育研究的视域牢笼，以“大社会”视角重新锚定问题意识。例如，将电子竞技现象置于数字劳动研究框架，或通过青少年体质下降现象透视教育内卷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体育真正成为理解社会转型的棱镜。在方法论层面，则需推动量化研究与质性深描的有机融合，揭示体育运动背后的社会机制，从而实现实践导向的范式升级。

3)普惠责任：强化学科公共性。体育社会学要强化学科公共性，必须通过双向的知识循环机制实现普惠价值。一方面应当向母学科输出原创理论范式，如将“体育移民”概念注入人口流动研究框架，或通过“体育仪式”模型重构社会整合理论，实现跨学科的反哺与滋养；另一方面则需积极介入公共议程，依托智库平台机制，采用短视频、政策白皮书等传播介质，将体育现象内蕴的社会机制(如乡土赛事承载的文化治理逻辑)转化为普惠性公共知识，最终履行价值引领与公众赋能的学术使命。

4 结语：在平衡中寻找学科的“成人礼”

体育社会学的成熟，不在于服务多少政策，而在于能否以独特知识回应时代诘问。当研究者从“解题者”蜕变为“提问者”——以身体洞察社会结构，用本土理论解释中国经验，让知识普惠于民——学科方能跳脱“工具化”宿命，在学术、实践与社会的三角平衡中，走向真正的自主与尊严。

治理滥觞下中国体育公共管理研究的未来方向

任慧涛

(扬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扬州 225101)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理论迅速成为指导我国体育公共管理事务研究的方法论。经过10余年发展，以多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治理等为代表的分析框架，已在公共体育服务、体育行政管理、社会体育管理、地方体育与基层体育管理等议题上产生广泛影响，催生了许多新思想、新概念，培育出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研究机构与学者群体，甚至形成了一些学派(董红刚，2025)。可以说，治理理论为中国体育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持续十余年的强劲动力。

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思想指导下，体育管理学正积极思考学科发展的创新路径(刘青等，2025)。作为次级领域，体育公共管理研究亦需反思。毋庸讳言，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我国体育公共管理研究在应用治理理论的情况下，出现了些许偏离。一是理论创新关怀不足，大量研究仅关注运用治理理论中的多元、协同、网络、博弈等概念解释体育案例，或套用既有规范分析框架诠释具体情境，鲜有研究基于本土案例推进理论本身的发展。二是理论内核适用性研究薄弱。许多研究虽提出应用特定理论模式或分析框架，但流于“现状—问题(困境)—启示(改进)”的三段式讨论，对理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论证不足，对其具体应用也缺乏精准把握。三是研究方法应用还需更加严谨，案例分析与调研脱离、田野调查深度欠缺、研究对象过于宽泛、理论贡献难以界定等问题在体育治理研究中亦较为普遍。

随着体育在我国国家公共服务和发展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其“公共性”日益凸显，必然需要使用治理理念予以探索。体育管理学作为实践取向鲜明的学科，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我国体育改革实践向纵深推进，研究关注的实践导向将更加突出、研究关涉的融合性将更加显著(杨桦等，2020)。这些变化必然要求将体育治理研究置于以公共管理学——乃至管理科学为核理论支撑的维度，超越简单的“与治理互动”，强化以治理为本位(theory of governance)的研究方向。

首先，需重点围绕该方向的学科内涵、研究范式和基本概念展开深入思考。持续追踪体育管理哲学(柳

伯力, 1992)、体育管理思想史(张晓义等, 2017)、理论框架和范式(骆雷, 2022)等蕴含的基础问题, 并尝试催生诸如黄谦等(2022)提出的“体育神经管理学”等自主知识体系, 为学科体系化奠定基础。同时, 应推动体育公共管理分析的科学化: 一是构建管理科学与工程相关理论模型, 运用规范科学范式验证关键假设(例如, “举国体制”中的投入产出机制); 二是运用跨学科方法处理传统议题, 引入口述历史、叙事分析等历史学方法, 民族志、扎根理论等人类学方法(李爱群等, 2020), 为“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愿景下诠释我国体育事业提供新突破。如杨磊、杨海晨(2019)使用自我民族志对孙睿诒、陶双宾(2012)提出的国家与个体的身体征用关系的反思, 很好地推动竞技体育治理研究。

其次, 可以在个体具身经验、周围在地场景中发掘, 重视案例的关键作用。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经验表明, 案例能够为学术谱系与理论进展提供丰富的养料。体育公共管理研究者需对体育相关的社会热点保持学术敏感, “村BA”“苏超”“广场舞”“体教融合”等现象均可提炼丰富学术议题, 利用这些身边可接触、可获得的材料来反思社区体育治理、全民健身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等研究。例如, 郁昌店(2014, 2015)利用自己家乡的“郇村个案”谈群众体育自组织运行与政府介入, 都展示了地方或基层视角的体育公共管理议题的可突破空间。除此之外, 中国地域广阔, 针对各个省域及以下的“地方性知识”生产空间关注不足, 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遗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不同区域的体育发展实践均需相应团队支撑, 该地区高校研究者可就近开展实地研究。

再次, 强化比较研究视野, 持续追踪国际与国内学界动态, 更新学术实践进展。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乃至国内学科建设的最新进展引入体育公共管理研究, 是展开比较研究的主要手段。同时需注意“全球体育治理”这一新的热门方向, 其本质是新时代我国区域国别学和体育公共管理的交叉。如果说“体育组织是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命题”(柳鸣毅等, 2021), 国际体育组织就是全球体育治理研究的核心命题。尤其是国际奥委会善治改革以来, 国际体育组织透明度建设成效显著, 大量政策、报告及过程文件公开可得, 这就为开展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资料便利。此外, 西方国家透明政府建设也促使大量体育战略规划、政府报告、政策规章等资料公开, 为体育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提供坚实基础。尤其是在我国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等背景下, 需要对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体育发展进行研究更新或从新视角进行“再发现”。

镜与径: 中国体育人类学的回顾与前瞻

涂传飞, 温悦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 中国体育人类学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 在新时代背景下亟待对其进行回顾和审视。

1 以“镜”为鉴: 学科特征与主要困境

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形成鲜明的学科特征: 一是鲜明的本土化特征, 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现象, 尤其是对武术等民族传统项目的研究。二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研究视野既包含对“为国争光”的奥运战略、国家体育制度等宏大叙事的分析, 也注重深入田野的微观考察。三是显著的跨学科范式, 学科理论与方法上尝试融合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体育学等多学科的视角, 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研究路径。四是强烈的应用导向, 研究成果致力于服务社会现实需求, 旨在为国家体育政策的制定、全民健身的推广、以及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

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是认识论困境。“身心二元”的思维方式, 将理性的“心智”置于感性的“身体”之上, 对中国传统体育“身心一元”的身体观解释力有限。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观下, 学者对何谓传统、何谓现代缺乏深刻认识, 常常带着对立的预设开展研究。在体育非遗研究中, 常常陷入“保护主义”思维, 对大量体育非遗的自发性发展关注不够, 陷入“保而失真”的悖论。此外, 还有一种“成功学”的认识取向, 动辄“XX赋能”式高谈阔论, 对一些新事物、新提法呈现出一种几乎乌托邦式的态度, 将其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二是方法论困境。随着中国社会高度的城市化与数字化, 经典的田野调查法边界日益模糊。许多研究者固守传统的村落场域, 不仅容易导致议题同质化, 如仪式功能的重复阐释、言农村体育必然借鉴宗族范式及文化权力网络等, 更易忽视新时代最鲜活的体育实践, 如传统体育在城市继续传承、虚拟健身社群、电竞文化、城市极限运动等。扎根理论使用不够严谨而产生争议, 部分研究陷入方法本位陷阱, 惯于“炫技”, 偏离了研究方法是为达成研究目标服务的初衷。三是理论困境。中国体育人类学面临着双重理论困境。一方面, 过度依赖西方理论而忽视中国本土概念工具, 导致在面对中国

复杂的体育实践时，容易陷入“削足适履”的尴尬，难以形成真正主体性的“中国话语”，呈现出一种“理论失语”。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满足于将新案例套入旧理论，缺乏与经验材料的深度对话和理论反思，甚至将“整词”这类学术投机行为视为理论观点创新，未能实现知识的有效增量。四是身份困境。学科身份的模糊性，是制约中国体育人类学发展的深层原因。它长期在体育学与人类学之间摇摆，既未能在体育学内部获得核心地位，也常被人类学主流视为边缘分支。这种学科归属的焦虑，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和清晰的发展规划，限制了其学术影响力提升。

2 以“径”求索：新时代背景下的转型与前瞻

面对困境，中国体育人类学必须主动求变，在新时代背景下寻找破局之路。

未来的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首要任务在于认识论的自我革新，即超越长期束缚学术想象的“身心二元”“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要求研究者摒弃“成功学”式的乌托邦想象与“抢救式”的保护主义心态，转向对体育实践中权力关系、社会不公与复杂后果的批判性反思，从根本上破解认识论偏差的问题。

研究方法“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除了沿用经典的研究方法以外，为回应中国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数字化与体验转向，可以尝试多元方法的创造性融合。如面对议题同质化与都市、数字体育实践的兴起，可以采纳“多点民族志”，同时，运用“数字民族志”深入虚拟健身社群、电竞粉丝圈等线上场域也是契合数字时代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要鼓励方法的“本土化创新”，在胡小明先生“动作分析法”等开拓性贡献基础上，继续探索植根于中国文化与身体实践的独特分析方法。

一是提倡借鉴古今中外的经典理论，尤其避免对西方理论的“拿来主义”态度，借鉴西方理论要注重与中国经验的调适。二是构建“中层理论”，提倡经验问题抽象化并与既有理论观点对话，从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提炼出具有解释力、可被验证的“中层理论”，如中国特色的体育非遗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等。三是以中国经验反哺全球理论，将中国体育的历史与实践作为独特的分析案例，去检验、修正甚至挑战源于西方的既有理论，如哈佛大学宋怡明对闽南舞龙的案例研究就是很好的尝试。

中国体育人类学应主动进行战略定位，将其塑造为连接不同学科、服务社会需求的“桥梁”与“枢纽”。一是要践行胡小明先生的构想，成为连接运动人体科

学与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通过整合微观的身体技术分析与宏观的文化阐释，在体医融合、运动康复等领域彰显其不可或缺的整合价值。二是打破学科壁垒，成为一个跨学科合作的“枢纽”，主动与医学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灾害人类学、教育学等领域深度融合，围绕健康中国、乡村振兴、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重大议题，提供独特的文化洞见与解决方案。

体育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困境与未来

魏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国际体育传播与外交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体育新闻传播学的交叉性和包容性正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学界同仁认同：除去传统体育类期刊之外，越来越多新闻传播学、艺术学和综合性期刊都在容纳体育新闻传播学相关研究，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者陆续在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之外的其他学科领域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有一定数量理工科甚至健康医学背景的学者正在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但与初创阶段相比，体育新闻传播学仍然同时处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的边缘区域，它不仅在各级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项目申报中被划为“其他领域”，更在两个母学科中缺少元话语力量。

当下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仍以应用研究导向为主，基础理论羸弱。由于两个学科体育学和新闻传播学都以实践为导向，长期都以“无学”著称，作为交叉学科的体育新闻传播学不可避免以当下实践为研究主体，形成长期以来的“玩具部”“运动员啦啦队”和“体育媒体吹鼓手”等角色，这与 20 年前的研究大体无异。纵观近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向，研究大都指向实践，这与课题指南和期刊发文的导向有一定关联，但也与本领域学者不愿意沉下心思学习体育新闻传播基础理论，花气力下功夫从事体育新闻史研究密不可分。基础理论耗费时间长、精力多，对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锐度都有更高要求，这对于追求“短平快”效应的硕博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而言“并不友好”，因此大家普遍敬而远之。例如，2022 年北京冬奥会、2023 年杭州亚运会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内容生产被翻来覆去研究，却没有人愿意探究这些内容生产的形式受到哪些影响，从何而来，未来会如何发展。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是近年国内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特征。20 年来，

国内体育新闻史研究的著作没有达到 10 本, 集中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理论的著作屈指可数, 这导致基础理论研究过多集中在少数学者, 学科整体发展并未从中受益。

其次, 越来越多社会学背景的师资进入体育新闻传播学教育团队之后, 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社会学研究特性益发明显。但在国内当下研究中, 不证自明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例如, 有的学者在研究中提出 5 个假说, 其中有 4 个都是无需实验就能推导出的常识性结论。在有些学者提出的问题中, 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其他学者在各种语境下反复论证过, 还有些问题本身就是不自洽的。传播学中的“5W”“框架分析”“使用与满足”等理论成为“重灾区”, 每年被研究者数以百计地重复使用。反观批判性研究几乎遁形, 尤其对体育媒介体制和实践的批判凤毛麟角。

再次, 对于新技术、新关系和热点事件(赛事)研究的关注异乎寻常的多。区块链、元宇宙、AI 等技术以及社交媒体、短视频媒体在体育领域的影响及其全新传受关系的研究成为近年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区域”, 但不少研究者对技术本身一知半解, 更无从知晓其底层逻辑和价值属性, 对实践自然缺少清醒的认知。近两年来针对“村 BA”“乒乓球饭圈化”问题的各类型研究数不胜数。媒介化是通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与全球化或“球土化”、商业化、职业化等思潮的结合展开宏观或中观考察的研究方法, “苏超”从创立到现在不过几个月, 处于不稳定的发展期, 怎么就可以运用体育媒介化理论加以考察?

此外, 国内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多数还只关注国内环境, 缺乏国际视野, 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全方位落伍。很多研究者无力区分体育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和跨文化传播, 更不用谈体育区域国别研究和体育的精准化国际传播。体育国际传播与体育外交、软实力、国家形象、国际话语权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当下的体育新闻传播学科研队伍很多都缺少相应的学科背景和研究经历, 对硕博研究生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最后, 国内当下研究关注高水平竞技赛事多, 对群众体育、残疾人体育、青少年体育和女性体育研究较少, 研究层次和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体育新闻传播学摆脱当下瓶颈的路径还是较为清晰的。第一, 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什么? “体育现象+新闻传播学原理”是否就算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 这个问题未被厘清。体育新闻传播学内圈层的体育新闻(宣传), 中圈层的体育运动及其现象的中介化与媒介化似乎相对清晰, 但当研究拓展到外圈层的体育传播(包含体育公共关系、体育营销等

领域)之后就缺少边界感, 无界限的学科融通让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陷入另一种困境。过去 30 年中, 传播学几乎没有出现新的研究范式, 大都是在过往的理论中出现新的排列组合或是在新语境中的探索。有相当一批学者是因为特殊的体育新闻传播现象或是体育重大赛事而“临时”跨界这一领域, 这让当下的国内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呈现出“庞大而无序”的特征。在笔者看来, 如果现阶段无法解决“体育为主、新传为翼、体传结合、中国语境为本、全球视野加持”的根本原则, 我国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可能会走弯路, 甚至会“舍本逐末”。因此, 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有必要, 也很迫切, 这有赖于该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努力。

第二, 突破师资队伍的学科壁垒。过往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教师和学者大都是新闻传播学和体育学背景, 这大致能够保证学术研究的相关性, 但却无助于学科深度融合发展。随着健康传播和国际传播日益成为国内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 具有更多元学科背景的师资队伍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 尤其是理工科、医科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和师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广度, 凸显其跨学科属性。体育人文社会学其他子学科研究者的偶然“跨界”也更能彰显体育新闻传播学兼容并蓄的特质。此外, 如何可持续地推动跨国跨文化的深度学术交流合作, 也是国内体育新闻传播学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第三, 击穿过往研究中的门户偏见。过往从事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体育院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 但今天学科的多元性和杂糅性让这种现状变得过时。全球主流传播学学会都设置了体育组或体育兴趣组, 但国内唯一的新闻传播学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还没有体育分会, 主要原因是成员单位远远达不到其二级学会的要求(一般要求在 30 个以上)。因此, 鼓励更多综合性院校和专业院校的师生“跨界”从事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 可以有力推动学科发展。2000 年左右, 由于体育新闻一度成为新闻传播学二级学科, 不少综合性院校都开设这一专业, 但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大都取消。2024 年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与新闻传播学院合作开办体育新闻专业。2025 年 5 月笔者所在的单位主办了体育传播国际学术论坛,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青年学者踊跃投稿, 使得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团队更加多元化, 这对于学科未来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四, 新闻领域有专业主义, 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存在“专业主义”路径。当下国内体育新闻传播

学研究的掣肘之一是缺少固定的专业学术期刊。国外体育传播研究领域在2006—2013年先后出现《体育媒介学刊》《国际体育传播学刊》和《传播与体育》3本专业学术期刊,这还不包括《国际电竞学刊》《电子游戏与电竞学刊》等更加细分、专业性更强的期刊。定期出版的学术期刊或论文集能够培养相对固定的学术团队和个体,让学者在不断地投稿和审稿互动过程中提升学术素养,同时让学术知识体系不断细分,提升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理化。目前国内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会议不少,但仅靠体育传播蓝皮书和间或呈现的论文集还远远不够。

(该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2&ZD314)研究成果。)

运动心理学中脑科学的研究省思

祝大鹏

(武汉体育学院 心理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9)

当前我国心理学界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过度脑科学化的发展趋势,与心理学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综合属性渐行渐远。从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科研项目,到学科专业评价、学位点评估等,好像没有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或实验室,就显得不那么高大上。甚至在教育部和一些省市的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立项课题也开始使用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ph, EEG)、近红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fNIRS)和磁共振成像技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开展研究。这种“研必称大脑”的现象导致学术圈里有一种调侃“心理学快变成脑理学”,这种风气已经延伸到运动心理学领域。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师资队伍建设和投入上的功利化。为了在专业学科评估、学位点申报等建设上占据优势,各大体育院校和相关体育科研院所开始大力引进具有脑科学背景的专业人才,希望利用他们的理论和技术优势提升引进单位的科研水平,增加研究成果。但这种盲目的人才引进可能会出现脱离学校或专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造成人力财力等资源浪费。此外,由于脑科学的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验室软硬件和实验设备、场所上需要较大投入,比如脑电、近红外等仪器及高级别核磁共振仪等大型设备的采购价格已经超过千万,且有些贵重仪器需要专人长期维护。

二是科研成果的转化问题。由于目前运动心理学领域的脑科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运动前、中、后人体大

脑特定区域的结构变化或神经活动特征分析,其性质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另一种类型的调查研究,或者说利用仪器对大脑结构或功能变化的“调查”,而其干预或治疗的研究相对滞后。这就大大限制此类研究的实践指导价值,也不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利用。

三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脑科学研究重点在于探索个体心理活动的神经机制,但这种神经机制的研究其运动心理学的依据是什么?对于运动心理学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什么?心理学的两大基础学科是生理学和哲学,脱离了哲学基础的心理学研究和脱离了生理学基础的心理学研究都不是一项好的心理学研究,这个研究方向也很难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某个脑区仅仅与某种心理特质或心理过程相关,而和其他的心理过程完全无关。反而是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了个体心理与不同脑区组合的神经网络有密切联系。当前运动心理学领域关于运动与个体大脑神经网络关系的研究相对匮乏。这就需要运动心理学领域研究者保持系统论哲学思想,并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中。

因此,对于运动心理学领域脑科学的研究迅猛发展的势头,我们既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将脑科学的研究范式和技术与运动心理学有机结合,促进运动心理学学科发展,同时又要保持清醒认识,正确看待脑科学的研究技术在运动领域应用的局限性。

一是注重理论与技术协同发展。在脑科学的研究中注重研究问题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依据,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建立“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的研究观念,保障研究技术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避免产生“仪器高大上=研究高大上”的认识误区。在理论基础上,运动心理学领域的脑科学的研究既关注运动中的人的行为(运动)与脑的联系,也关注运动中的人的心理(情绪、认知)与脑的联系。这就需要研究者明确界定所关心或研究的问题属于单一研究还是综合研究问题,并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行为主义或(和)认知主义心理学理论。此外,在对测量获得的电生理指标数据的分析中也要结合相关理论,不能仅从生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把运动心理学研究变成了运动生理学研究。

二是加强系统论研究思想。当前脑科学的主要技术脑电、近红外光谱技术和磁共振成像技术分别从神经功能活动、组织形态到血液动力学多方位研究运动与脑的结构与功能,但每一种模态在时间分辨率、空间分辨率、有无创伤和成本等方面各有优势和局限,这也造成了单一模态研究的局限性。今后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加强多模态研究方法与技术的使用,并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以提高研究设计的全面性、系统

性与科学性, 准确获取脑组织的定位和脑功能的动态过程, 更加系统和深入地从不同层面分析运动中人的认知神经特征。

三是研究要加强应用导向。作为一门偏应用型学科, 运动心理学领域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要加强成果转化。根据研究人群不同, 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或运动方案, 服务于高水平运动员、青少年、一般锻炼人群和特殊人群等, 助力“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是运动领域脑科学的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也是该研究领域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保障。

作为一门应用型的科学, 运动心理学研究应秉持“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学术思想, 在生理学和哲学这两大学科的基础上, 突出运动这一特定场景, 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客观、辩证地认识脑科学的研究技术在运动心理学研究中的作用, 提高运动心理学学科中脑科学的研究在研究理论上的明确性、原创性, 研究设计上的科学性、系统性, 研究成果上的应用性、实践性。

规范、动力与趋向: 体育史学 突破困境的路径选择

张博

(成都体育学院 体育史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41418)

体育史学科一经产生, 其学术话语与知识谱系, 呈现出鲜明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特征。经过百余年的发展, 体育史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老”学科, 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 初步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局面, 并形成了一系列令学界瞩目的研究成果。笔者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体育史学研究存在的现实困境和解决方案, 提出一管之见。

1 体育史学研究的现实困境

1.1 忽视学术史研究, 低水平发表论文现象值得警惕

步入21世纪后, 体育史方向的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明显增多, 这说明体育史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关注。必须指出的是, 在体育史学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堪忧。产生这一现象的因素很多, 不重视学术史研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有的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 就有学者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 但是, 学术界对此视而不见,

仍然进行研究和探讨, 却较少提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 更有甚者, 采用“剪刀”加“浆糊”方式, 堆砌出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

1.2 热衷跟风式研究, 体育史研究难以向专精深发展

近年来, 体育史学术界热衷于“跟风式”研究, 甚至有热点议题出现后, 学术界一窝蜂地围绕同一议题发表论文。这些论文中, 不乏有高质量研究成果, 但多数论文难以看到研究者本人的深入思考, 在史料挖掘、理论的适用性等方面没有新的突破, 不仅论文质量一般, 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界对更多体育史研究议题的思考, 限制了体育史研究向专精深方向发展。

1.3 缺少学科层面思考, 体育史学研究领域严重失衡

近年来, 除了少数学者致力于体育史学基本理论研究外, 多数学者较少从学科层面思考体育史研究的趋向性等问题。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从外国体育史研究领域来看, 存在着“厚西薄东”现象, 即研究欧美国家体育史的较多, 研究亚洲地区体育史的较少。从体育史基本理论的研究来看, 通过国际史学前沿来构建体育史研究理论方法的多, 从中国体育实践提炼体育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少; 从中国体育史研究领域来看, 研究中国体育自身发展史的多, 立足国际视野研究中国体育史的少。

2 体育史学走出困境的路径选择

2.1 重视学术史研究, 恪守学术规范

当下已有部分学术期刊明确要求稿件须有学术回顾, 学位论文国内也有学术综述的具体要求。但是,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学术史研究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而学术史研究是恪守学术规范的重要环节, 是提升论文质量的关键问题。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通过重视学术史研究, 提高学界对学术规范的认知程度。一方面, 高校、科研机构要按照规范化、实用化的要求, 围绕体育史学位论文写作, 精细设置课程; 另一方面, 需要从事体育史学研究的同仁在从事具体议题研究时, 首先系统梳理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对于期刊来说, 应进一步要求作者的稿件, 必须有学术史回顾, 且这一回顾要系统、科学和规范, 从而提高发表论文的质量。

2.2 洞悉内生动力, 拓展学术议题

步入21世纪后,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对体育史学牵引作用效果显著, 这也是体育史学发展的“内生动力”所在。据统计, 自2010年以来, 在体育史研究领域, 先后有“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研究”“中国古代文物调查与数

据库建设”“中外学校体育思想史整理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1949—2019）”“中华武术通史的研究与编纂”“近现代以来我国体育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研究”等重大项目获批，并集聚一批学者从事研究，产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体育史学发展的“内生动力”仍然会起到牵引作用，相关重大项目选题，仍然有广阔的拓展空间，由此亦会产生更多的学术研究议题。

2.3 把握学术趋向，引领学术发展

无论从国内外学术界热点议题来看，还是从对体育实践的体育史学回应的视角出发，体育史研究领域存在着明确的研究趋向，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能起到引领学术发展的作用、亦可在一定程度解决研究领域失衡的问题。如当下我国的一些城市提出了打造体育赛事名城的目标，这也需要体育史学人对国际上的著名体育赛事名城发展史加以研究，并提供相应经验镜鉴；国际上的体育城市是如何形成的？国际赛事名城打造的基本路径是什么？体育赛事名城的打造，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研究国际上城市体育发展史，必将受到学术界的日益关注。此外，运动项目技术的流变、规则的演进，运动项目的全球化传播、在地化发展和反向传播等问题，都需要学界加以研究。

最后，笔者认为，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较早形成的学科，体育史学应该在学科谱系问题上提供经验。因此，要重视体育史学术谱系以及流派构建等问题，要在相关研究中充分展现研究团队的合力。学术谱系或流派构建本质是基于一致的学术视角或观点，并形成了一定的学术研究传统。在未来的研究中，学术界要充分重视这样的研究团队的相关研究。只有构建体育史学的学术谱系，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流派，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百家争鸣的局面，进而在争鸣中推动体育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后《体育法》修订时代的体育法学

韩勇

（北京体育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自 1984 年中国学者发表体育法学相关论文以来，中国体育法学已经走过 40 余年历程。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立法与修法，是推动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促进中国体育法学发展的重要事件。

《体育法》的立法和修订，一直是中国体育法学研究的重点。在 1995 年立法和 2022 年修法前后，来

自体育院系和法学院系学者们对其中涉及的各类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团结和培育了研究队伍。体育法学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研究也反哺了《体育法》，尤其是在 2022 年修法过程中，体育法学专家学者全程参与发挥重要作用，体育法学研究成果为一些制度建立和条文修改的理论基础奠定提供了依据。

但是，紧紧围绕《体育法》“无法立法，有法修法”为导向的研究，也有值得警惕或者遭到诟病的地方，其局限在于它仅仅站在法律之内看法律，忽略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2025 年正值《体育法》颁布实施 30 周年。在这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作为体育法学人我们一定会追问：后修法时代的中国体育法学应该向何处去？

第一，体育立法仍然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体育法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体育法》修订完成标志着我国体育法治建设迈出重要一步，但并不意味着体育立法工作的终结。当前我国体育法律体系仍存在不足与发展空间，中国体育还只有“一法七条例”，与教育、卫生等领域由多部法律组成的法律体系仍然有较大差距。职业体育、学校和青少年体育、全民健身等领域，要么需要新的立法，要么需要对原有立法进行修订。围绕下一步体育立法工作重点，仍然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不完全是以对策法学的方式，而是以法社会学等多种方式开展研究。

第二，要增强问题意识，阐述体育法学主体问题。无论是围绕体育法立法，还是体育法治建设，以问题为中心都是体育法学研究的着力点。我们既需要回应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体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法律问题，也不能无视体育行业某一细微具体但对行业有重要影响的法律问题。体育行业有大量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需要研究者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如休闲健身行业中，体育指导员、教练员、救生员等资格证书考核部门、考核安排是否满足需求，考核项目的合理性、国际国内证书互认、假证等问题；再如反兴奋剂中，中国反兴奋剂的特殊制度和规则，如对辅助人员的处罚、部分运动员违规时团体处罚、运动员禁赛期满复出的规定均比国际反兴奋剂规则更严格，其立法基础、必要性、执行情况、当下能否做出变更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并从法学视角，对制度建设和标准优化提出建议。

第三，要正视国际视角与中国问题的关系。作为极具跨国性、国际性特色的行业，中国体育必然要关注国际体育发展态势，国际体育规则变化，尤其是国际奥委会、国际足联等国际体育组织、国际体育仲裁院、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则变化与案例新趋势。在

过去20多年中,中国体育法学学者大量译介国外最新研究进展、规则与案例,极大丰富了中国体育法学研究。同时,中国有自己既不同于西欧体育模式,也不同于北美体育模式的独特体育模式,在未来也不太可能完全西欧化或北美化,而是政府直接管理为主、体育组织社会性管理为辅的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我们应立足中国本土体育法治实践,探索中国体育模式下的独特法律问题并做出解答。

第四,要加强对体育特殊性的寻找和研究。体育法学并不研究法学知识在体育行业的简单应用,体育法学要研究那些最具体育特殊性、无法用法律的一般知识解决的问题。近10余年来,中国体育法学界都在努力挖掘带有体育特殊性的法律问题。体育规则、体育纪律处罚、体育纠纷解决与仲裁、反兴奋剂等这些在体育行业纵向管理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是最具体育特殊性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中国体育法学所指向的体育特殊性,也不完全等同于欧盟的体育特殊性和西欧学者笔下的体育特殊性。除了纵向的体育管理中产生的法律问题,一些横向的民商事和劳动关系中产生的法律问题,如球员合同与转会、体育伤害的自甘风险、体育赛事转播权、体育标志权等适用用现行国家法时存在争议的问题,也都被视为带有体育特殊性的问题。中国体育法学语境下的体育特殊性到底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五,加强理论创新。长期以来,体育法学因其紧密联系体育实践、不断回应体育行业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强烈的应用性特征成为体育学中的“显学”,其学术组织、学术活动、学术共同体、课程等学科外在建制先于学科内在建制先建立起来。然而,作为一个学科,体育法学标志性的内在建制仍在建设中,尤其是其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体系,以及标志性成果,都需要进一步总结提炼,从而尽快完成对中国自主体育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从“他山之石”到“晓喻新生” ——论中国体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郑志强

(集美大学 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特别是体育产业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体育的经济属性受到关注,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体育事业要讲究经济效益,积极创造条件实行多种经营”催生我国首批体育经济学课程建设。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精神推动了体育领域1994年开始的体育职业化改革。2008年成功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带动一系列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热,由此带来的包括体育用品企业、体育市场营销等成为该阶段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的成立意味着体育经济学术团体开始成立。2008年体育产业统计被正式纳入国家统计分类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体育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2014年46号文明确2025年“体育运动人口达5亿人,体育产业产值5万亿”的目标。此后2017年《健康中国》、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文件先后出台,提出到2035年体育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预计将达约5%。2025年《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企业和体育赛事,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以健身休闲和竞赛表演为龙头、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融合发展、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的新时代体育产业体系初步建立,冰雪产业、体育智能设备等体育新业态持续涌现。目前全国已有近40个高校获批体育学一级博士点。包括江小涓、洪永森等在内的知名经济学家纷纷开展体育产业的研究,体育经济研究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得以彰显。体育经济学以丰富的研究内容、多样的研究方法、广泛的应用领域和多学科交叉成为体育学科非常活跃的一个分支。

体育经济学主要研究体育场景下的经济规律,经济学和体育学的融合交叉主导了学科的发展。传统经济学依托强势地位、系统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对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发挥一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但现阶段也带来巨大副作用:中国体育经济学的核心内涵和知识表达面临西方学术话语的“帝国主义霸权”和知识体系的窠臼,照搬移植而来的国外理论无法完全解决中国体育问题,也难以有效回应体育实践需求。

老子道德经有言:“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晓喻新生。”现阶段我国自主体育经济学体系已经面临“破”与“立”的必然选择。如何以中国体育产业实践强化理论建构,以中国观照强化问题意识,以中国立场强化本土和历史意识,以中国自信参与国际互融互鉴,成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体育经济学知识体系的路径选择。

(1)以中国体育产业实践强化理论建构。中国体育产业的丰富实践为理论的自立自强提供良好支撑:从

北京冬奥会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到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中践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成为“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到打造体育新业态，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的欣欣向荣，中国体育产业治理所具有的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知识体系，成为可能超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的实践，使我国体育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不断增强，文明传播力不断跃升。

(2)以中国观照强化问题意识。中国体育经济学要确立其自主性，就必须打破西方经济学对中国问题的“有色眼镜”和先期议题设置的束缚，自觉观照被忽视、忽略的中国现实问题，将其挖掘、拓展为我国的研究议题，并基于典型事实提炼出标志性概念，实现我国体育经济学自主的规律性认知。当前我国体育的迅猛发展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人工智能、电竞、体育碳中和、冰雪产业高质量发展、青少年运动健康干预和三大球振兴等，都是具国际性更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应坚持直面并解决这些新时代的重大体育实践问题，由此积极推动彰显中国自信和中国智慧的体育经济理论创新，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中国方案。

(3)以中国立场凝聚本土和历史意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大不同在于其是知识建构者对理想世界的表达，具有鲜明价值观和阶级立场。中国体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表达中国立场为方向指引来凝聚和强化本土和意识。其主要内容离不开我国的本土实践性与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明体达用”的文化智慧、“修齐治平”的伦理实践、“天人合一”的哲学认知和“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与古希腊竞技体育的“身体崇拜”为基础生发出的现代西方体育的工具理性分野鲜明。我国厚重历史积淀的文化养分，无疑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体育经济学的核心知识基因，由此在传承中实现自主知识的赓续与创新，结合我国体育产业的本土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充分表达中国立场。

(4)以中国自信参与国际互融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中国体育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对西方既有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彻底否定，而是旨在依托中国体育实践，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扬弃与重建，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与互鉴，这也是对4个自信的深刻践行。一方面，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西方体育学理论与知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开放性的知识流动必然

是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现阶段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领域存在“有理说不清，说了没人听，听了不认同”的窘境，保持开放有助于体现中国体育经济学知识的对外有效输出。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产业实践积攒大量成功经验和理论素材，由此所形成的体育经济学知识也只有在持续开放环境中能被世界各国所检验和吸收，并反作用于原有知识体系的丰富和完善。由此建构的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同样可为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中国智慧。

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研究的桎梏与纾解

邵峰

(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随着体育全球化进程加快，体育已成为国家间、软实力竞争、政治博弈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体育国际话语权作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体育强国战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作用。体育国际话语权作为国际话语权的衍生概念，有着区别于国际体育话语权的特质。一是在结构上，体育国际话语权以“国际话语权”为核心，“体育/国际”平行修饰，聚焦体育领域话语能力，是国家软实力战略的一部分，兼具法定话语权利与实际话语权力，是国家多元行为体参与国际事务、表达利益诉求的动态实践。二是其重心在于“通过体育实现国际话语权”，具有功能化、手段化特征，强调借体育争夺国际体育场域话语权，通过文化辐射实现软权力渗透。从地缘政治看，体育国际话语权是衡量国家实力、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以塑造本国良好形象和维护最大利益为目标。三是其内核为“文化解释权”，合法性基于“知识-话语”共生关系，依托体育文化软实力，具有“民族性”特质。在宏、中、微观层面分别表现为结构性影响力、具体事务利益博弈能力与规则制定权。概言之，体育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育场域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决策的权力，本质是国家借体育维护本国利益，通过在该场域获得话语权提升国家影响力。

1 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研究的桎梏

当前，对体育国际话语权研究依然停留在宏观或中观层面，缺少更为深入和具象化研究。一是话语载体的依赖性与边缘化问题。在国际体育传播场域中，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占据话语主导地位。我国体育话语

的国际传播高度依赖官方媒体渠道与大型赛事平台, 缺乏多元话语生态, 尚未形成具有全球辐射力的自主传播体系与矩阵。一方面, 主流叙事多围绕国家荣誉、金牌数量等内容展开, 难以形成全球化叙事逻辑; 另一方面, 我国在国际主流媒体、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代表性与话语位置较低, 难以打破“信息次级输出国”的地位, 导致话语权被弱化。

二是内容生产的单一性与话语认同缺失。体育内容的国际传播不仅仅是语言输出, 更是价值观、文化理念的传播。我国在体育内容的国际表达普遍存在情境适配不足、跨文化解码能力弱、价值共鸣力低等问题, 常常以自我为叙事中心, 忽略对国际受众接受度的关切。因此, 一些体育理念、价值观、文化常常无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推崇, 甚至被误读为“政治的工具化”, 从而削弱其影响力与亲和力。

三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弱势与议程设置嵌入不足。一方面,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国际体育制度理念嵌入性不足, 制度方案贡献率较小。另一方面, 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代表性仍不充分, 制度人力资源与软性资源较低, 关键制度决策机构参与决策权缺失。此外, 在规则制定、议题设置与标准认定方面, 我国鲜有主动发声或制度输出, 难以构建话语嵌入机制。

四是文化传播的符号势微与共鸣性阐释滞后。体育文化符号的全球影响力是话语权构建的核心要素之一。欧美国家通过塑造体育明星、打造赛事IP、输出体育时尚与叙事风格, 建立了强势的全球体育话语体系。相比之下, 我国体育符号多停留于民族主义情感表达与仪式性展示, 缺乏可全球共鸣的文化形象与叙事策略, 难以实现“文化转译”与“语境共建”。

2 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研究的疏解

一是构建多元聚合联动的体育话语传播体系。打破传播路径单一、话语出口单薄的困境, 应积极构建以多元平台为载体、立体化表达为策略的话语传播体系。一方面, 顺应全媒体传播新趋势, 建强融合传播矩阵, 推动主流媒体体育话语传播机制创新,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媒体集群。另一方面, 加强与国际主流媒体合作, 扶持我国原创体育媒体、平台型企业参与国际体育内容生态, 推动我国体育议题进入全球公共舆论场。

二是提升体育内容的全球表达能力。体育叙事的

全球传播, 需要面向不同文化语境设计内容表达策略。贯通自身既有体育话语, 联结国际体育权威话语, 推动体育内容的“去政治化”表达, 突出团结、和平、绿色等全球共享价值; 建立面向国际的体育话语叙事案例库, 优化术语体系与表达范式, 从情感向度入手处理好话语表达方式规范性与生动性、故事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最大限度地将体育话语中蕴含的理性力量和情感力量激发出来, 真正触达国际受众的心灵深处;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相关成果赋能体育国际传播精准化的实现。

三是增强制度参与与规则塑造能力。制度性竞争是话语权争夺的关键环节。提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地位, 应鼓励我国体育官员与专家积极参选国际组织职务, 加强国际体育组织人才培养; 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提出议题、制定区域性体育规范, 提升区域影响力; 将自身制度理念主张和诉求与具备高度权威性、显著正当性, 且拥有广泛接受度的体育制度话语联结; 加强与国际体育法律体系的接轨, 提升制度话语权的合法性与专业性。

四是打造具有全球共鸣的体育文化产品。体育文化产品是承载体育话语形态与话语权的现实表征。一方面, 打造全球认可的体育艺术影视精品、纪录片、明星IP、赛事品牌等体育标志性符号载体。另一方面, 强化体育品牌叙事能力, 将文化价值塑造与品牌叙事整合, 打破欧美主导的体育品牌文化话语体系, 实现从“跟随着”到“引领着”的转变。同时, 创新体育艺术文化, 引领国际体育文化审美, 依托国际赛事平台, 推动中华美学范式从符号输出转向价值传播, 以差异化标准参与全球体育文化话语重构, 形成示范性发展模式。

概言之, 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研究不仅关乎我国体育在国际上的发展, 更是国家整体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在体育国际关系中的参与程度在不断提升, 但其在国际体育话语体系与体育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只有从传播体系、制度参与、文化建设、表达方式等多维度系统布局, 才能真正实现从“听得见”到“听得懂”、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转变。未来, 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专业的表达、系统的策略, 推动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的结构重塑与价值重构。

